

八年抗战中的 东北救亡总会



NEUPRESS
东北大学出版社

前 言

在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的中国抗日战争中，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各群众团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的东北救亡总会则以其成立早、活动时间长、成效显著而占有特殊的地位。

东北救亡总会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东北流亡同胞为主体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它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关内东北救亡团体发展演变的高峰。它于1937年6月正式成立后，公开活动达5年之久。1942年5月在重庆被蒋介石国民党取缔以后，它又以“反攻杂志社”为阵地，一直战斗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

在中华民族英勇悲壮的八年抗战中，东北救亡总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擎着抗日救亡的大旗，率领五千多名会员，团结几十万东北流亡同胞，联合各界进步人士和抗日救亡团体，克服重重困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了艰苦不懈的斗争。它是东北流亡同胞在关内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和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

然而，这样一个功勋卓著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它被康生诬之为“特务外围组织”，有些成员蒙受了不白之冤。“文化大革命”中，它的主要领导成员高崇民、于毅夫、陈先舟、车向忱、卢广绩、栗又文、张庆泰、吴

一凡、徐寿轩、张克威、柳文等，又被打成“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惨遭迫害，直到1978年10月才得以平反。可是，东北救亡总会的革命性质仍未得到认定。直至1984年7月24日，中组部下发《组通字[84]22号文件》时，才指出东北救亡总会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直接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

抗日战争胜利40年后，东北救亡总会终于有了科学定性，晚则晚矣，终可使当事者欣慰。但迄今为止，除偶见几篇散论和片断回忆外，尚无一部系统的论著。无疑，它的历史全貌及其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还有待于学术界的研究与评述。

我们在研究进程中，访问了一些当事人，也在长春、北京、重庆等地搜集了一套东总会刊——《反攻》杂志。《反攻》在当时是国统区呐喊抗战到底的重要期刊，在今天则是研究东总以及国统区抗日救亡民主运动的重要史料。为读者研究方便，本书特将一些共产党人、东总负责人以及著名民主人士在《反攻》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各选一篇附后，同时也将《反攻》发表的一些能够反映东总特点、《反攻》概况以及史料价值较高的文章一并附上。

作者

1996.12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东北救亡总会成立前关内东北救亡

团体的演变 (1)

一、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5)

二、复东会 (18)

三、东北旅平各界救国联合会 (23)

四、东北抗日救亡团体演变的两点启示 (31)

第二章 东北救亡总会的成立与巩固 (39)

一、“东总”的筹建 (39)

二、“东总”的成立 (44)

三、中共“东总”党组 (47)

四、南京改组 (49)

第三章 “东总”在武汉 (55)

一、创办《反攻》半月刊 (55)

二、抗日救亡洪流中的先锋 (63)

三、与国民党特务组织灵活斗争 (70)

四、撤离武汉，一分为四 (74)

第四章	“东总”三大分会的建立与活动	····· (78)
一、	“东总”陕西分会	····· (78)
二、	“东总”华北分会	····· (84)
三、	“东总”成都分会	····· (86)
第五章	“东总”在重庆	····· (91)
一、	关于抗战到底之“底”的论争	····· (91)
二、	活跃的“东总战地服务团”	····· (98)
三、	积极参加民主宪政运动	····· (101)
四、	蒋介石扼杀“东总”	····· (106)
第六章	坚守《反攻》阵地，迎接抗战胜利	····· (110)
一、	转变斗争策略，坚守《反攻》阵地	····· (110)
二、	成立“东北民主政治协会”	····· (114)
三、	“东总”的特点及贡献	····· (116)
附 录		····· (123)
1.	邓颖超：献给流亡关内的东北同胞	····· (123)
2.	胡 绳：统一战线在前进中	····· (128)
3.	蓝 渤：一年来关内东北人民的救亡运动	·····
		····· (133)
4.	于毅夫：《反攻》两周年	····· (142)
5.	高崇民：冷言冷语录（九则）	····· (149)
6.	阎宝航：七年来东北同胞的奋斗	····· (161)
7.	陈先舟：东北知识青年应有的时代认识	·····
		····· (166)

8. 王卓然：胜利在望与东北省府	(170)
9. 王化一：给东北青年们	(174)
10. 广 声：七七抗战后的东北抗日联军 ..	(178)
11. 冯玉祥：把日本强盗完全赶出中国去 ..	(181)
12. 沙千里：中国宪政运动的回顾与展望 ..	(184)
13. 韩幽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	(195)
14. 张友渔：现阶段的国际形势	(198)
15. 青山和夫：日本投降问题	(201)
16. 发刊词	(206)
17. 为纪念“七七”痛告东北同乡书	(209)
18. 东总华北分会东进工作团告东北同胞书	(212)
19. 东北救亡总会反对汪逆成立傀儡组织通电	(218)
20. 纪念“九一八”十一周年	(220)
21. 华而实：西战场的出版事业	(223)
22. 仲 航（译）：华北游击队的奋斗	(231)
23. 丘 琴：募寒衣（工作特写）	(238)
24. 许凌青：反攻三部曲	(240)
主要参考文献	(242)
一、报 刊	(242)
二、书 籍	(242)
三、访问记	(244)
后 记	(246)

第一章 东北救亡总会成立前关内东北救亡团体的演变

(1931年9月~1937年6月)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制造了它蓄谋已久的侵略我国的“九一八”事变。由于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大多不战而退，致使日军仅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就吞并了相当于其本国国土总面积3倍的我国东北三省。从此，三千万东北同胞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几十万人被迫远走他乡，流浪到关内或其他地方。

地处我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不仅拥有广阔而富饶的大地，并且是我国的边陲重地和战略要冲，很早就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垂涎，特别是沙皇俄国和日本更把它作为侵略的重要目标和相互角逐的场所。早在1858年至1860年间，沙俄政府就先后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璦琿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霸占了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确定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侵略扩张国策，^[1]把侵略矛头对准了中国。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强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和辽东半岛。虽然由此激化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矛盾，引发了俄、

德、法三国干涉日本退还辽东半岛，但日本与沙俄争夺中国东北的角逐愈演愈烈。1904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在战争中大败沙俄，夺得了其在旅顺、大连的租界及中东铁路支线自长春起至大连一段的南满铁路。从1906年开始，日本在东北先后建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三个侵略机构，在东北巩固和扩张其殖民统治。

1914年8月，日本借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对德宣战，出兵占领了济南、青岛和胶州湾，取代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侵略地位。

日本军队控制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之后，黄海几乎成了日本的内海，中国京畿重地直接裸露在日本的兵锋之下。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蛮横地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迫使袁世凯政府承认了除第5条之外的所有要求，从而取得了在东北修建铁路、开设厂矿等一系列侵略特权。

1917年段祺瑞上台后，日本政府继续推行侵华政策，狂妄地宣称：“满蒙不是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应在长城以南”，“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应“立即开发满蒙”。^[2]

1927年6月2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要》，赤裸裸地提出：“满蒙，特别是东三省”，对日本“有重大利害关系”。日本应对其“作特殊的考虑”。当日本“在该地的特殊地位、权益有遭受损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都应“决心不失时机地采取

适当的措施”。^[3]“东方会议”后，田中义一将会议决策以《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为题，于1927年7月25日上奏日本天皇，此即后来被称为《田中奏折》的秘密文件。此件狂妄地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田中奏折》中还详细地策划了日本占领满蒙的步骤。

1929年底，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地冲击着日本。为了摆脱国内危机与矛盾，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从1930年初到1931年7月，日本派出大批军事人员在东北各地实施军事侦察与实地训练。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在东北日军共演习50余次，参加人数7000余人。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吞并我国东北的年代，东北地区正处在张作霖奉系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

绿林出身的张作霖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成为“东北王”，并进而于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掌握了北京政权的。但是，以吞并东北为国策的日本帝国主义与张作霖的统治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当1928年6月张作霖被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打败，被迫离京退守东北时，日本帝国主义于6月4日阴谋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毁了张作霖乘坐的专车，张作霖负重伤当天死去。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利用这一事件引起东北混乱，然后以“维持治安”为名占领东北要地。但是，张学良子承父业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稳定了东北政局，并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

政府，改旗易帜”。

张学良东北易帜使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了东北，但国内各军阀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9月，张学良率兵10万进驻平津，拥护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致使蒋战胜了冯、阎，张本人也于10月被蒋任命为国民党政府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1931年4月，张在北平设置了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行营，坐镇北平。“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东北军有14万精锐部队驻扎关内，只有不足13万人的部队驻在关外，加之在事变爆发时又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致使东三省在数月之间便沦入敌手。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抗日救亡已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迫切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抗日救亡运动有如浪潮般地涌动着。在这声势浩大的救亡浪潮中，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人民站到了斗争的最前线。他们的反日斗争基本形成为两条各具特色的主线：一条是在东北沦陷区内采取军事打击为主的武装斗争。它经历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4]两个阶段；一条是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同胞组织的各种抗日救亡团体，这主要有“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复东会”和“东北旅平各界救国联合会”。它们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影响面有大有小，与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关系也深浅不同，但它们都是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都对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同胞的抗日救亡运动起过组织、领导的作用，对东北沦陷区内的武装反日斗争也给予过积极支持，为东北救亡总会的成立打下了

基础。

一、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1931年9月~1933年7月)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的东北同胞最早建立的抗日救亡团体。1931年9月27日它成立于北平，1933年7月被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强令停止公开活动。由于它抗日救亡旗帜鲜明，宣传鼓动形式多样，武装斗争有声有色，所以它虽然存在不足两年，却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东北抗日义勇军坚持战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辽宁省各法团和反日团体领导人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车向忱^[5]等相继逃亡北平。他们与在北平的王卓然、王化一^[6]等联合各界东北人士和青年学生，在张学良的暗中支持下，于1931年9月27日，在北平西单牌楼旧刑部街12号奉天会馆东院——哈尔飞大戏院，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是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执行人，^[7]但是张学良国难家仇系于一身，他执行不抵抗命令也很矛盾。他很清楚东北沦陷无疑使他与东北军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地。他在召见东北籍旅平青年学生代表时曾说：“我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言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8]他也曾以自责的心情对东北军将领何柱国说过：“国土不能守，父仇不能报，我是一个民族罪人，我

有何面目再见东北父老。”^[9]张学良这种既不能违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又不甘心丢掉东北的矛盾心理，是他在“九一八”事变后暗中支持东北人民和爱国官兵进行抗日复土斗争的内在原因。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由卢广绩主持。与会者400多人，多为东北籍。大会经热烈讨论，通过了以下几项主要决定：

1. 本会宗旨：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

2. 入会条件：不限东北籍人员，凡有国家观念，主张以武力抵抗日军之人员，皆可入会。

3. 主要任务：聘请军事人才，组成特别委员会；发动东北民团、散兵、土匪，组成抗日游击力量；聘请大学教授、熟谙外交及世界情形之人才，组成设计委员会，设计外交方面事宜；训练青年学生，组建学生军。

4. 将奉天会馆东西两院作为救国会办公地点。

大会还通过了卢广绩委托胡石如^[10]起草的《告东北民众书》，为救国会成立宣言。

大会成立时选举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杜重远等27人为委员。10月21日召开全委会议时，又选举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彭小秋、霍维周、熊飞、杜重远、李梦醒等9人为常委，并组建了总务组、宣传组和军事组，由各常委分别负责。

1932年1月12日，常委会举行会议研究机构改组问题。25日，机构改组完成：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设执委41人、常委15人、监委5人；原总务组改为秘书处，由卢

广绩、高崇民负责；原宣传组改为宣传部（后改为政治部），由阎宝航、杜重远负责；原军事组改为军事部，由王化一负责。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后，主要开展了两方面的工作：

第一，宣传抗日，奋起救亡。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告东北民众书》中就疾声呼吁：“吾东北三千万民众，数万里国土，今日已在日人铁蹄蹂躏之下矣！”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危机存亡之秋，千钧一发之时也！”因此，要“群策群力，同舟共济，以与倭奴决一雌雄。”“为主持正义而战，为保障和平而战；为民族生存、国家安宁起见，均不得不出于最后一战！”

针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日侵略妥协退让，《告东北民众书》指出：“日人占领辽吉后，即实行其吞并朝鲜之故伎，先使东北各省‘独立’，然后进而‘保护’，以达其鲸吞之夙愿。切望国人勿堕其狡计，甘为傀儡，以自弃国人，而同招灭亡。”

1931年9月27日，国民党因党权之争而公开对峙的宁粤双方首领蒋介石和汪精卫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会议在表面上是以“国难当头，应加强团结”为由，实则是双方进行权力再分配的一次会议。28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借“和平会议”召开之机，组织东北流亡同胞和各东北民众团体代表组成“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赴沪请愿，以期唤起民众，敦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会议推举冯庸大学校长冯庸为总指挥，王化一为副总指挥，

卢广绩、苏上达、李梦醒、高崇民、阎宝航等9人为指挥。请愿团共有628人，分编成12个分队，于11月5日由北平乘车出发。

请愿团出发前发表了《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宣言》。《宣言》除抨击国民党政府“在此国家存亡关头，喧嚣月余不闻有对外办法”外，还向社会提出“（一）和会立即成议，（二）立即完成统一政府，（三）准备对日宣战”^[11]三项具体要求。

7日晨，请愿团抵达南京车站，当即散发了大量要求国民党政府“准备对日宣战”的宣传品。晚抵达上海，受到中华职业社社长黄炎培、上海市青年会总干事陈立廷等人的热烈欢迎和招待。当他们得知“和平会议”已于是日结束，并未达成有关抗日协议后，遂立即发表宣言如下：

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钧鉴：此次吾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来沪向和会诸公请愿，原抱有极热烈之愿望，冀以至诚，促进党国领袖诸公之团结，组织强有力政府，以拯救我水深火热之同胞，以恢复我光明灿烂之东北！孰知吾辈到沪之日，即代表离沪之日，团结终于未成，统一永陷绝望，内心隐痛，诚有不忍不向国人一剖陈之。

党国不幸，东北失陷，稍具血性，无不力图团结，一致对外，况党国领袖诸公！果也自暴日侵略辽吉，而后有和议之举。吾东北民众虽惨遭田园庐墓之墟，亡省之痛，举首南中，尚存一线希冀，不意和会虽开，纠纷未已，国难纵殷，自私未消，旧帐不清，政争不已。始以国难而来，反置国难而不谈，终以分开四全大会而散，统一无望，对外无力，是视东北为化外，等民众如鹿豕，事之惨酷怨痛，孰逾于此！夫吾东北三千万民众，微论无负于党国，无负于领袖诸公，即或负之，方其在水深火热之中，睹其焦头烂额之状，亦应动惻隐之心，为拯救之举。何至熟视无睹，无动于衷！

吾人离乱之余，敢举一言以告国人：即东北亡，内地断难独存。回忆李鸿章於三十年前，即谓朝鲜亡，满洲必亡，满洲亡，中国不能幸免！今也何如，不幸李氏之言验矣！东北被占，华北动摇，长江沿岸不安，全国俱陷恐怖！窃恐享奴隶之尊号者，不止吾不幸之东北民众已也。即党国领袖诸公，亦处於不为东海烈士，必为租界寓公之惨况，纵欲悔祸团结，弃嫌救国而亦不可复得，痛乎否也？

所望党国领袖诸公，际此国家存亡之关头，立弃旧嫌，再图团结，救东北即所以救中国，救中国，即所以救己身。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力促党国领袖诸公之猛醒，一致对日，以救东北，救中国，则吾中华民族，尚堪幸存於世界，否则吾人所欲言，不忍言矣！全国同胞，其共勉之！

反对四大会分开！

反对国民政府分立，促进和平统一！

全国民众一致对日经济绝交！

准备对日决战！^[12]

9日，请愿团兵分两路：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等人面见汪精卫、胡汉民，痛陈民众抗日救亡之心声，要求政府对日开战；王化一率领请愿团其他成员冒着倾盆大雨在南市区游行示威。他们高呼抗日口号，吸引了众多上海市民自动加入到游行队伍当中。10日，请愿团由上海返抵南京。11日晨，便列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当他们得知蒋介石已躲在中央军校时，便冒雨赶到中央军校，要求面见蒋介石。蒋介石不得不在下午3时，在中央军校大礼堂出见。他看了请愿书后，敷衍说：“政府对外作战已具决心，一切计划，不便宣布”。“对外交涉，政府自有办法，人民不应过虑”。至此高崇民立刻问道：“政府是否还要东三省？我东北民众现在未出者日被屠杀，已出者将流亡为乞丐，党国领袖

诸公对此水深火热、焦头烂额之状，曾否发过恻隐之心？政府如要东三省时，十六号国联仍无效（按：国联理事会于10月24日做出决议，要求日本军队于11月6日以前撤兵），宜用何种有效方法收回失地？请主席立予答复，以释群疑。”^[13]蒋介石听后则以“具体办法不便当众宣布”为由，搪塞了过去。

“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声势颇壮的南下请愿是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一次公开的抗议活动。“九一八”事变前，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国民党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民族投降主义方针，把反共作为其首要任务。“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洞开国门，放狼入室，却又幻想依靠国际联盟主持“公道”来制止日本的侵略。国民政府外交部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致电国联哀告说：对于日本的侵略暴行“中国始终未予抵抗，应请主持公道。”^[14]9月2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国民书，竟然要求在日军铁蹄践踏下的国民“应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态度显露无理暴行之罪恶”，“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以求公理之必伸”。^[15]而国际联盟理事会于9月22日通过的决议则不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无视日军侵占中国大片国土的事实，荒谬地要求“两国立即撤兵”。^[16]这就是国民党政府所祈求来的“公理”！它唯一的作用就是使蒋介石国民党的误国卖国政策大白于天下。因此，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公开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放弃“不抵抗”政策，迅速对日宣战的南下请愿活动就一时间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一些报刊追踪报道请愿团的活动，北平《实

报》还发表了题为《难能可贵的救国请愿》的专评，对这次南下请愿给予高度赞扬。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为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经常组织各种报告会，派出多支宣传队，到各地群众中开展活动，同时还把每月的18日定为“亡省纪念日”，每年的9月18日，定为“亡省周年日”。每逢“亡省纪念日”和“亡省周年日”都要着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2年2月，它在北平出版了由李全林主编的《救国旬刊》，“志在阐扬中华民族精神，叙述抗日战绩，报告抗日消息，采集抗日策略，团结抗日分子。”^[17]9月，又在北平出版了由王卓然主编的《复巢》小报和《东北通讯》，及时报道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的战斗消息，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各地的种种惨无人道的暴行，阐述救国会的抗日救亡主张。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共存在两年，期间它为宣传抗日救亡发表了大量的宣言、通电、论文，组织了多次报告会、联谊会、亡省纪念会等活动，为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二，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

组织军事力量进行武装抗日是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后确定的重要任务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同日本侵略军进行浴血战斗的，有东北军旧部、警察、民团，也有民间秘密结社的大刀会、红枪会以及绿林帮伙。他们的武装抗日大都是自发的，且分布广阔。他们有群众积极支援的优点，但也有各自为战、势单力孤、互相缺少联系等缺点。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